

#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 :学术 观察、思考与开发

谭学纯

---

文学修辞研究的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在不同层面关涉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近年国内的研究格局出现了学科分化: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研究,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研究,二者的优长蕴含着学科渗融的可能性。学科渗融的文学修辞研究,不应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应生硬链接域外理论,而需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这里既有学科生长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整合性要求,也有学科碰撞激发文学修辞研究自我调整的动力。

---

从宏观的学科背景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影响力的结构性扩散,导致了修辞学与众多相关学科的碰撞。反映在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中,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方面,文学研究进入成果密集阶段,研究主体面临后续的方向性选择,学科的能量转换部分地在文学修辞研究领域重新集结;另一方面,部分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界向文学界突围,通过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这里既有学科碰撞产生的驱动力,也有学科生长对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整合性要求。

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空间主要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与此相应的研究群体自然也主要来自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国内的这两个学界分别在哪一个层面研究文学修辞?不同学科的文学修辞研究呈现为什么样的格局?如何通过互为镜像的比较参照,开发文学修辞研究的生长空间、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学理结构并探寻技术升级的操作途径?以上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 一、文学修辞研究 :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

文学修辞研究的完整面貌,是由语言层面的修辞技巧和文本层面的修辞诗学共同支撑

的。这样说,既有民族化的传统,也有他者化的参照:

### (一)本土学脉: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共在的传统资源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传统资源十分丰富:从《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品》之类的论著,到历代诗话、词话、曲话,都交织着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话语。即便是修辞史家较少注意的评点性文字,也包含了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共在的思想资源。

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之“囿囿语”、“炼字说”,较多地从修辞技巧立论,但“小说为骨诗为魂”则指向修辞诗学,触及小说话语的诗质以及诗语和叙述话语的交融,道出了小说和诗歌“文体间性”的一种修辞形态。古典章回小说每以“但见/便见/只见”、“正是/真是/却是”、“有诗为证”为话语标记,引出诗体文字写人绘景,把一般性叙述转化为描摹性叙述,作为叙述结构的修辞调整。或者承载评论教谕、警世劝诫的道德语义。“有诗为证”以修辞幻象的形式,暗示语言再现的“似真”世界,消解小说的虚构本质,满足接受者对小说故事真实性的审美期待。“有诗为证”意味着小说家操持另一套话语出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小说的尴尬,同时也有着修辞诗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中国作为诗的国度,诗歌话语资源在小说文体中的显影,透露的正是“小说为骨诗为魂”的接受取向<sup>①</sup>。这种民族化特征明显的话语方式,在西方小说中较少见。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希腊文学作品以诗体为多<sup>②</sup>。小说文体兴起后,西方小说对诗语的接纳,不像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么常见,更不像后者中的诗语那样承担着重要的修辞功能。

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互相缠绕的传统学脉,不仅见于可以观察到的文本现实,也见于深隐层次的文学思维和宏观的文化结构。

中国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中的“弃子—逐臣”现象,似可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义上解读:从弃子到逐臣,是行为主体从被父母抛弃到被集团驱逐的修辞性置换。“弃子—逐臣”,是家庭行为向朝廷行为泛化、家庭权威向社会权威泛化。原属家庭伦理的弃子行为,转换为政治范畴的逐臣事件,进入文学书写。逐臣悲凄的生命呼喊响彻着对朝廷的忠诚,弃子泣血的低吟流贯着对父母的依恋,二者可以纳入一个同源相似的结构性隐喻之中<sup>③</sup>。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芳草美人”喻象,也需要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义上解读: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卜算子·咏梅》),都是男人“他者化”的修辞设计:自喻求宠的女性,重新出场,为自己重建一个与君主对话的空间。重建对话空间基于以下认知图示中的修辞结构:

美人迟暮→壮志难酬

美人见弃但矢志不移→请纓无着者的精神苦恋

这个修辞结构不仅仅是修辞技巧层面的相似关联,更有着修辞诗学层面的“模式”意义。

### (二)域外理论:修辞诗学多于修辞技巧的研究格局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是“修辞术”。智者学派定义的修辞术,是“说服的技巧”<sup>④</sup>,这可能导致误解。亚氏所说的“修辞术”=修辞技巧。

《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对于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理论边界界定得并不分明,作者把修辞学和诗学都归入创造性科学<sup>⑤</sup>。这或许透露出一种信息:在他看来,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理论纠葛。道格拉斯·基尔近期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作为两部著作问世,会导致人们以为这两个学术文本分属不同的知识范畴。他为此撰文《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指出:《诗学》探究文学话语的类别、元素、技巧和诗歌体式的本质,《修辞学》研究话语,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有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基尔进而分析莎士比亚剧

本的修辞技巧和香港媒体豪宅广告的诗学意味,说明《修辞学》和《诗学》的理论关联及其在“后读写时代”的意义<sup>⑥</sup>。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其研究对象有别:前者研究话语,后者主要谈悲剧,对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深度各有侧重,《修辞学》对修辞技巧的关注多于对修辞诗学的关注,这不等于说《修辞学》只谈修辞技巧而不涉及修辞诗学。

这种研究格局进入文学修辞研究,发生了逆向性变化。随着西方叙事文体的发展以及修辞研究向文学叙事延伸,使得域外的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的关注开始多于对修辞技巧的关注。

从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关注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到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强调“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sup>⑦</sup>,再到保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通过修辞性阅读实现文本自我解构的寓言化,它们虽然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显示一个共同的倾向: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问题的关注,多于对修辞技巧的关注。“北大演讲丛书”之一、加拿大学者高辛勇的《修辞学与文学阅读》正是在修辞诗学的意义上使“修辞”和“文学阅读”走出了技巧层面。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也表现出对“淹没在修辞的细微末节之中”的“书房技巧”的不信任感<sup>⑧</sup>。还有一部著作不能不提,那就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书中告诉我们,本真的历史如何通过历史叙述成为修辞化的历史。这本书作为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对文学修辞研究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如果说,怀特论证了“历史想象”的结果是“修辞性的”,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断则是“文学想象”的结果更是“修辞性的”<sup>⑨</sup>。在怀特的表述中,“文学性的”、“修辞性的”、“诗性的”常常互相指涉,这本身也说明,怀特所说的叙述的修辞性,语义指向修辞诗学。

参照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原本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共同支撑的文学修辞研究,在中国当代的学术走向中走出了两条技术路线——

## 二、学科分化: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化,有学术评价和学科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也有研究者主观认识的依据。

在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文学修辞研究的关键词“修辞”,存在着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区别。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的阅读反应,似可佐证。

### (一)布斯《小说修辞学》:阅读反应和不同学科的理论选择

比较中国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布斯《小说修辞学》的评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者在理论选择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学科倾向。

语言学界评价《小说修辞学》:

在修辞学家的眼里,任何一段话语都包含着作者的意图、话语的意义以及读者对话语的反应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作者力图运用一切手段组合话语,以便使读者的反应纳入创作意图的轨道。用柏克的话说,使作者与读者在理智、情感和态度等方面取得“同一”。布斯正是以作者、话语和读者三者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本论点来研究小说修辞学的。他把小说和史诗这类语言艺术视为这样一种话语形式:读者对作品的分析、理解、评价与欣赏时时处处受作者的控制。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

辞技巧,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sup>⑩</sup>

文学界评价布斯《小说修辞学》: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最关心的问题,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亦即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他把该书取名为《小说修辞学》,并不是去探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这便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本义上去了。<sup>⑪</sup>

比较上面两段关于《小说修辞学》的评价,可以观察到:

《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明确表示:“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辞技巧,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小说修辞学·译序》强调布斯并不是探讨小说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所谓“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的本义”,表面上是重返亚里士多德,但它更多地是在诗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论辩与演讲技巧的意义上回到古希腊的。因此,《小说修辞学·译序》将《小说修辞学》视为现代英美文学批评和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sup>⑫</sup>。

文学修辞,是指向修辞技巧,还是指向修辞诗学,对此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同类研究各有所重。二者的学术目标、技术路线、学术面貌、成果流向,有较明显的学科特征。

## (二)模式1: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和巴赫金的批评

### 1. 学术目标 透过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

以文学文本中的称谓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郑阿财从九篇敦煌变文中28处使用的“阿婆”,考察构词、词义及唐代称谓词的语用表现<sup>⑬</sup>;崔山佳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和明代戏曲中“嫂子”、“干娘”、“亲娘”、“哥”等几个称谓词,补充未收入词典的义项<sup>⑭</sup>;范崇高考释《搜神记》中九个称谓词语,修正辞书和古籍校注中的相关失误<sup>⑮</sup>。从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的角度说,这些论文是高质量的。但是这些称谓的修辞功能是否从句子层面向文本层面扩张?是否对文学文本的叙述结构产生影响<sup>⑯</sup>?模式1的研究一般不涉及这些问题。以解释语言学问题为学术目标的文学修辞研究,固守着自己的学科边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话语语言学研究延伸到了文本的篇章结构,但其学术目标仍然是解决语言学问题。如郑庆君的著作《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和话语结构研究》,以“句段”为基本单位,考察《骆驼祥子》的关系系统、描写系统、照应系统、比较系统,采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的是语言学的结论,这从全书目录、概念术语、结论等可以看出<sup>⑰</sup>。至于语言学结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和支持文学修辞研究,此书和模式1的同类研究通常留着应解释而未解释的空间。

### 2. 技术路线 语言世界→言语世界。

模式1分析的起点和落点都在语言。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多分析文学文本的佳词丽句,如“三仙姑”的脸“像驴粪蛋下了霜”(赵树理)、葛郎台的头发“像黄金中掺着白银”(巴尔扎克)。有些佳词丽句作为话语经典,确有言语运用的示范意义。模式1在这方面一般语感敏锐,落实到文本的话语分析时,往往十分精细,对语言学理论的自身阐释深入而到位。台湾学者竺家宁认为,语感经验丰富的语言学者,“可以看到一般人未注意到的言语特点,正如‘庖丁解



牛’面对一篇作品时,他眼中所看到的已非‘全牛’,而是一块块的语言片段,有机地组合起来”<sup>⑧</sup>。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语言学界的主流立场。

### 3. 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 突出语言学面貌 学术反应主要在语言学界。

模式1的学术面貌具有明显的语言学特征,偏重修辞技巧,长于语言分析,疏于文本驾驭。发现问题的角度是语言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语言学的,参考的同类研究成果主要是语言学的,最终的目标指向也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语言类学术期刊或综合期刊的语言学栏目,影响力主要在语言学界,较少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较少被文学界引用。文学界的学术刊物较少发表、转载、转摘这一类成果,文学界也较少关注、较少引用这一类研究成果。“语言世界→语言世界”的技术路线,不支持此类研究成果流向文学界的学术期刊。基于语言学学科经验的文学修辞研究,较少考虑文学界的接受反应。

我们不必要求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一定要考虑文学界的反应。但是,处于文学和语言学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学界的反应,或较少进入文学界的阅读视野,可能多少有一点遗憾。特别是,当文学修辞研究的语言事实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料,同时又是文学文本结构的修辞元素时,如果仅仅分析文本中的语言事实,而不考察这些语言事实如何支撑了文本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修辞结构,就可能会关闭很大一部分解释空间。

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其学科分工、学术分工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追根溯源,可以从索绪尔的知识体系里找到理论支撑。

一方面,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自然语言研究和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分工:前者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后者研究的是自然语言进入文学语境的功能变体——文学语言,它属于“言语”而不是“语言”。

另一方面,索绪尔关于符号“所指”/“能指”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工:文学研究文学作品的“所指”,语言研究文学作品的“能指”。按竺家宁先生的划分:文学符号的“所指”包括作品的情节、内容、情感、象征、人物塑造、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的意象、写作背景、作者生平等等;“能指”涉及诗文格律、用韵,以及修辞学里所谈的部分问题<sup>⑨</sup>。这样一来,文学符号的象征、言外之意、诗的意象等便淡出了语言学研究视野。而像布斯、费伦、德曼、巴赫金等人的侧重修辞诗学的理论资源,也较少成为模式1的理论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绪尔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指导意义大于对“言语”研究的指导意义。而文学修辞研究对“言语”特殊运用的重视,基于对“语言”普遍规则的追寻。按说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应该考虑这一学术事实,但可能是出于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的信奉,对文学修辞研究本不具有多少实际指导意义的索绪尔理论,深深地渗入了有着语言学背景的文学修辞研究主体的思维。

而这正是兼有语言学和文艺学学术眼光的巴赫金所批评的。他反对文学修辞研究分析“语言的生理上的组织标本”,认为文学修辞不等于“艺术家个人技巧的语言学上抽象的语言”,强调解释文本修辞统一体的构成和话语秩序:“这个关系最近的修辞统一体,决定着每一因素(词汇、语义、句法等因素)的语言和修辞面貌。”<sup>⑩</sup>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长于词、句、段的诠释,但如果疏于文本的整体把握,一般就只能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修辞,较少能解释修辞所建构的文学文本,也不容易找准与作家的修辞意识相契合的理论落点。因此当阐释对象从细碎的话语材料转移到整体的修辞设计、作家的表达方式和文本深层意蕴的关系时,模式1研究的解释力就相对弱化了。

### (三)模式2: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和韦勒克、沃伦的提醒

偏向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弥补了模式1的缺憾,但也弱化了模式1的技术性。其学术目标、技术路线、学术面貌、成果流向,区别于语言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 1. 学术目标 透过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并解释文学问题。

多分析文学意象、意境、主题、形象、话语方式、叙述策略、修辞行为、修辞过程与意识形态运作、修辞与话语权力的共谋和分离、修辞在后殖民理论中的位置等,并提供文本语言和修辞方式的证明,最终的理论指向是文学问题。

### 2. 技术路线 文学世界→语言世界。

长于文本整体把握,疏于具体的语言分析。能够比较成功地阐释作家的艺术世界,但在解释作家的艺术世界所依托的语言世界时,有着语言学背景的读者有时会感到接受短路。语言学界欣赏模式2对文学文本结构的整体驾驭和论述的灵动,胜过欣赏它对文学存在方式与语言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

### 3. 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 突出文学面貌,学术反应主要在文学界。

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泓峻的《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郭洪雷的《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较多地认同修辞诗学意义上的“修辞”,而不是修辞技巧意义上的“修辞”。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里有部分篇幅考察了宏观修辞技巧和微观修辞技巧。但透过“修辞技巧”的术语表象,可以读出:作者认为小说修辞的学术目标,是在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我—你”关系,即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这表明,作者的小说修辞观与W. C. 布斯和詹姆斯·费伦注重的修辞诗学很接近。而蓝棣之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sup>①</sup>,从论文标题似乎就可以看出,从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到这里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是修辞诗学功能从叙述方式向抒情(诗歌)方式的位移。而该文的副标题“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定位。

模式2的学术面貌具有明显的文艺学特征:偏重修辞诗学,其强势研究在文本的整体把握方面,而语言分析往往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势倾向。发现问题的角度是文艺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文艺学的,参考的同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文艺学的,最终的目标指向也是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文学类学术期刊或综合期刊的文学理论栏目,影响力主要在文学界,较少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较少被语言学界引用。语言学刊物很少发表、转载、转摘这一类成果。“文学世界→语言世界”的技术路线,不支持此类研究成果流向语言学界的学术期刊。语言学界比较注重此类研究成果的语言学含量,而这些通常不是有着文学背景的研究者的强项。

阅读文学界的文学修辞研究成果,时常与语言学术语相遇。这是学术文本的符号表象,“隐喻/转喻”、“能指/所指”、“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进入文学界的话语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该术语所涉及的学科经验。联系具体的学术语境,对照概念术语的实际所指,可以感觉到,语言学基础有时也许没有夯实。对此,韦勒克、沃伦的提醒可能有些言重,但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sup>②</sup>

事实上,虽然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目标不是解决语言学问题,但它也离不开语言学的学理支撑。在必要的语言学训练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介入语言学领域,有时会陷入两难:如果动真格,研究者不一定熟悉并能实现语言学研究的技术要求,可能因此引发一些来自语言学界的诘难;如果虚晃一枪,不涉及语言学的实质性问题 and 基础要求,那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学术展开,是否会在具体操作中成为理论的空壳资源?

面对两难之境,有学者选择了智性的处理方式。孙绍振的《名作细读》注重语言分析而不用语言学概念。他在跟我的交流中,明确表示远离“能指”/“所指”之类的语言学术语。但他提出了语言学知识谱系之外的一对很有解释力的概念范畴:“词典语义”/“文本语义”。孙绍振认为,国内的文学文本分析,语言之外的分析多,抓住语言的分析少。一些表面上注重字、词、句的分析,多半死在词典语义中,在文本语义中活起来的少。“词典里的意义非常有限,而在具体上下文(语境)中的语义,却因人而异,因事而即时生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无限多样的语境和人物身上,同一语词所能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名作细读》里的很多篇章,正文前用黑体字提示了需要细致分析的关键词。文学修辞研究从关键词句入手,基于孙绍振如下的认识:在经典的文学文本中,语言常规运用的可分析性小于超常规的运用,而超常规的语言运用“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关键的词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这种地方,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语言的精妙”<sup>②</sup>。分析词典语义向文本语义的变异,进而破解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不可能仅仅在修辞技巧层面解释,还需要向修辞诗学延伸。

在操作层面如何实现从修辞技巧向修辞诗学的延伸,需要进入下面的讨论——

### 三、学科渗融: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 (一)学科渗融: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现实与可能

处于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本身隐含着一个预设:能够在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出入往返的研究主体,其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

在这方面,模式1和模式2的研究主体总体上的知识分配体现出各自的长处:

模式1:语言学知识 > 文学知识 / 模式2:文学知识 > 语言学知识

模式1的学术操作自由度设定较严,这对学术研究的随意性是一种制约,对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当文学修辞的研究不以纯语言学研究为最终目的时,可能限制研究者的思想展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解释空间。这就使得语言学研究十分看重的“解释力”遗留了一块阐释的空地。

模式2的学术操作自由度相应扩大,打开了研究者的思想空间和解释空间,为理论扩容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开阔的学术视野,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信息量。但是当思想的敏锐和理论的深度落实为文本细读中的语言分析时,语言学的学术面貌不一定能很好地体现。在提炼规则、避免孤证、排除并解释反例等语言学研究注重的问题上,模式2也孜孜以求,但从文学修辞研究同层次成果观察,它可能不像模式1那样自觉。

研究模式的选择,只是选择一种解释路径,本身无可置疑。针对同样的文学修辞现象,研究者选择模式1或模式2,通常出自他的学科经验。甲可能更擅长模式1,乙可能更擅长模式2。或者,同一个研究主体,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分别选择模式1或模式2。这就像甲擅长拳击或柔道,乙擅长跆拳道或空手道,不同的竞技名目有不同的攻击能量和实战效率。行为主体选择其中之一,自有他的合理性。

但是,拳击、柔道、跆拳道、空手道如果能优势互补,就可以为搏击注入新的能量。李小龙用他的截拳道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理由,能不能整合模式1和模式2的优势,探索二者相互激活的会通点呢?

#### (二)模式3:兼及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偏重修辞技巧的模式1和偏重修辞诗学的模式2,依托各自的学科背景。有经验的读者,依

据论文摘要和关键词,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学科背景。因为论文摘要和关键词所呈现的,是一个学术文本最浓缩的学术话语及其背后的学科经验。学科经验意义上“我”的强势在场,以福柯所说的“知识的权力”抵御“他者”的介入。学术话语承载着学术信息进入学术传播,按学科惯常的技术路线进入理论腹地。这些通常在本学科的话语场内进行。学科是支持这种话语运作的平台,也是理论晦暗处的合法庇护所。这是一种隐在的权力。

模式1、2的研究者中,有我敬重的学术朋友。这两种模式的文学修辞研究成果,不乏学养深厚的精致文本,其思想的深邃、技术的精妙、逻辑的力量令人欣赏,也会激发读者再开发的欲望。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中,分析文学修辞研究模式1、2之优长,思考巴赫金、韦勒克、沃伦批评中的有益成份,使得模式3逐渐清晰起来。

#### 1. 学术目标:从文学文本的语言表象,解释文学的语言性问题和语言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修辞研究,既不是限制文学出场的语言研究,也不是语言缺席的文学研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最常见的理论表述,隐含了文学在语言中生成、语言向文学开放的双重命题,这意味着文学修辞研究需要在文学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文学性的双重空间重新定位:文学的语言性在本体论层面构建解释框架,语言的文学性在艺术论层面寻求理论支持。如果文学修辞研究脱离语言性,就等于剥离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如果脱离了文学性,就等于回到了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观察和语言分析。

#### 2. 技术路线:语言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

模式3构建“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立体分析框架,兼顾文本内部和文本外围,同时聚焦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语言形态。既分析局部的修辞技巧,又注重修辞技巧在文本修辞结构中的功能和关系,既注重语言在文本修辞结构中的积极能量,又解析语言成为建构修辞化文本过程中的负性元素的原因。从成功的文学修辞“该如何”和不成功的文学修辞“是如何”的两极逼近同一个价值尺度,文学经典应该同时是修辞上的语言经典。

#### 3. 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语言学面貌和文学面貌并重,同时关注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学术反应。

由于文学修辞研究既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因此需要比较参照、探寻生长空间、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学理结构,需要启动研究主体的双重经验:语言经验和文学经验,需要调配研究领域的双重资源:语言学资源和文学资源,需要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完成具体的操作。作为对以上操作的检验,处于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似应分别流向语言学 and 文学刊物,接受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学术审视<sup>②</sup>。

#### (三)模式3不是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是生硬链接域外理论

行文至此,读者也许会发现,文学修辞研究呈现出“合一—分—合”的逻辑路向:

合:本土传统和域外理论同时关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

分:模式1偏重修辞技巧、模式2偏重修辞诗学

合:构建从修辞技巧向修辞诗学提升的模式3

“合一—分—合”的逻辑路向,不是回返性思路,而是重建性思路。

回顾本土资源中修辞与文学的共生因子,关注域外修辞研究向文学叙事延伸的生长态势,可以发现:本土传统和域外理论留有不同的解释空间和操作难度,需要以现代意识审视传统资源,重返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基础,经过合理扬弃,为学术生长输入新的动力,同时以民族意识审视全球化的理论背景,参照域外同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一个更开阔的学术平台



上进行前沿交流,在碰撞中生长,在对话中整合,提升理论格局,修正操作实践。

问题是,怎样由修辞技巧延伸到修辞诗学?怎样在修辞诗学的框架中处理修辞技巧?对此,本土化的理论表述点到即止,要言之,积章句而成篇。但理论上的章句积而成篇,进入实际操作时,又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修辞理路如何实现?可操作性交给了作者和读者。

从“篇”的角度观察“句”,句子通常是非自足性的。一个最小的叙述单位在句子中完成,是句子自身的封闭。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局部封闭的句子向周围开放着。这个开放的空间需要其他句段来填空。篇章语义的饱和,依赖于连贯性叙述中句段语义的不断生成。句段语义链条如何延伸,制约着篇章语义链条的完整。故事及故事走向、情节及情节推进、人物及人物关系,都作为相关参数,形成动态的结构模型。这里较少固定套路,而较多地取决于作者的修辞意图,以及为了实现修辞意图需要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修辞结构。这里的变数很多,弹性也很大。如何把其中的原理描述为可以观察到的外显形态,中国传统文论似乎更相信读写者的“悟”,而少有实证性的解析。

中国古人不重解析的外显性修辞结构,在域外的文学修辞理论中得到了部分的阐发。但国外的文学修辞研究对象毕竟是非汉语文本,其理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在面对汉语文本时不一定能完全对号入座。这里需要汉语经验的介入,注重汉民族思维方式及汉语写作的审美特征。

基于这样的认识,模式3一方面吸收模式1、2的学术智慧,清理它们的理论库存,整合二者之优长,悬搁二者之遗憾。另一方面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

在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重建文学修辞研究的话语场,对研究主体的知识储备、学术敏感、拓宽解释空间的能力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挑战意味。而挑战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挑战意味着研究主体思维定势的打破,伴随着学科发展动力的新一轮输入。学科的良性发展,需要在不断挑战和积极应战的能量驱动下,以更高层次的学术观察,构建更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话语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修辞研究的一种自我调整。

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为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生长空间的延展提供跨学科的观察与思考,也希望本文不会被误读为对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现有成果的苛求。它只是基于一种学术期待——期待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研究。多元共存的研究格局和文学修辞研究的不同模式,在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中丰富,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旧质的新变和技术升级。

① 朱玲:《文学文体建构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8页。

②④⑤ 罗念生:《修辞学·导言》,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第2—7页,第6页。

③ 谭学纯:《“弃子逐臣”:一个结构性隐喻》,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22日。按:尚永亮的《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弃子逐臣”现象有深入精到的分析。

⑥ 道格拉斯·基尔:《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变哩译,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⑦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⑧⑩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第37—40页。

⑨ 谭学纯:《历史与修辞相遇》,载《光明日报》2005年9月29日。

⑩ 王德春主编:《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⑪⑫ 周宪:《小说修辞学·译序》,见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2页。

- ⑬ 郑阿财:《敦煌变文中称谓词“阿婆”综论》,载《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⑭ 崔山佳:《明清白话作品词语称谓语补义》,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
- ⑮ 范崇高:《〈搜神记〉称谓词语札记》,载《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 ⑯ 谭学纯:《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
- ⑰ 参见郑庆君:《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和话语结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⑱⑲ 竺家宁:《语言风格学之观念与方法》,载《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⑳ 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 ㉑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 ㉒ 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257、255页。
- ㉓ 模式3的部分探索个案,可参见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文学语言研究》,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语言教育·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语用环境·语义变异和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载《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颖

·书 讯·

##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

冯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是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系统地考察了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引进、译介和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实践,揭示了现代性西学东渐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即用西方文论中的意义经验个人化、文本自足性和反历史决定论在逻辑上促成了主导中国文学理论界多年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解体。著者指出,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转型,表现出一种总体性走向多元化、历史理性走向文化心态、元叙事走向话语经验的嬗变规律。

该书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变革的历史主题——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解体的揭示;其二,对西方现代文论推动 20 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变革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程序的梳理与归纳;其三,指出走向全球化的中国文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现代性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迷失,并对此缺陷做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称现代性西学东渐之前的文学理论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认为改革开放这场“解总体化运动”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全球化,其结果是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解体,即思想解放,但又带来了文化身份失落的理论困境。